

西南大旱与“城市恐龙化”

本报特约记者 朱晓阳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现在整个西南旱区都在抗旱，从田间到山间，从干裂的河道到井边，一些堪称英勇的举动也不时出现在媒体上。但是，通过一些地方旱情报道的蛛丝马迹，我们不得不问：为什么在一些地方旱灾会严重到如此程度？疑问很容易使人去追问这些地方的水利系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在这里我以一个地方为例。有报道说昆明市官渡区靠近滇池的自卫村的土地无水浇灌，而且从滇池引水的公司沟都见底了。公司沟是一条引水渠，地处滇池东岸边的回龙村一带，是用来引滇池水进入马料河河道的沟渠。

滇池水流入公司沟，在一个叫小新村的地方被泵高10米，进入滇池六河之一的马料河河道，在需要浇地的时节，水沿着河道流到滇池盆地东端的跑马山脚，这一路上有很多闸口、涵洞和支渠，通过它们水流入滇池东岸的数万亩良田。这就是昆明东岸著名的小新村灌溉系统。这个灌溉系统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抽水站最早为龙云出资所造，1955年灌区扩大，成为今日的规模。在同一地区还有其他几个利用宝象河河道提滇池水进行浇灌的抽水站。这些水利工程是社会主义集体化时代的纪念碑，它们加上同一时期建立的排洪沟渠，使滇池岸边近10万亩易受旱涝灾害的田地变成旱涝保收的良田。过去半个世纪中，这个地区的人民对当地政府和执政党的信任与这样的水利工程直接相关。

那么“公司沟见底”的状况是如何形成的呢？不久前有另外一则关于滇池水的报道称，虽然大旱，但由于前年雨水丰沛，滇池蓄水高于往年。以我最近几年对这一带水利史的研究和实地调查所得，公司沟见底的根本问题是多年不疏理，沟底淤积不堪，在大旱之年滇池水位一有所下降，水就进不了沟，抽水站无水可抽，自卫村的土地当然无水可灌。20世纪80年代以前，每一年灌区的各村都要抽调劳动力对公司沟的淤泥进行清除。2008年，我曾问小新村抽水站的管理员是否还定期疏理公司沟，他们回答已经好多年不搞了。因此，当见报道说沟底都露出来的时候，我就想到，沟渠失修是这个地区旱灾加剧的原因。

与这个地区的旱灾有关，还有一个事实必须提到。那就是一条沿着滇池东岸从北向南直插向昆明的呈贡片区的城市大道——昆洛路，对这个地方的水利系统的影响。这条路于2005年建成，被地方政府和媒体称为高速公路的“现代典范”。我在2008年曾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谈到这条昆洛路如何毁坏滇池东岸的小新村灌溉系统：

“昆洛路的一个问题在于它的设计和建设只考虑连接昆明市北部与新建的呈贡片区。设计者没有考虑大道所经过村庄的人们的生计方式和习惯。例如这条路修建之后，路基和排水沟比路两侧的小村耕地高出两米左右。这样一来就使穿越公路的灌溉输水渠道不能像原来那样顺畅地输水到公路西侧的耕地里，抽水站于是乎不得不加大抽水量，结果又使路东侧的耕地被水淹。这条路不仅破坏了这些村庄所依靠的马料河灌溉流域的水利系统，而且也破坏了这一带的泄洪系统。当这条路和周边新建的楼盘都以明显的高度形成一些‘岛屿’之后，村庄则成了洼地。当地政府管农业的领导人称：自从昆洛路修成后，左村庄几乎每年雨季都遭水淹。”

透过几万亩农田灌区在旱灾中的状况，我们看到的是过去十几年急剧发展的城市化如何在大旱之年使灾害变本加厉。近来我常用“城市恐龙化”来描绘目前这种城市的巨型膨胀及其不可持续性。以上所谈的水利状况正好说明恐龙城市是如何殃及池鱼——其所处地区及其居民的。它将他们的生存环境毁坏，最终也将毁坏自己的生存环境。

就昆明而言，这个被旱灾考验出来的城市恐龙化对滇池流域的影响有多严重？这里可以引用

和分析一些基本数据。滇池流域的面积是 2920 平方公里，如果只算平原和盆地，面积仅有 590 平方公里，其中有近 300 平方公里为滇池。按照官方规划，到 2010 年昆明市的中心城区面积应该控制在 164.25 平方公里，但昆明市主城区在两年前就已达 249 平方公里。

更关键的是，这个大昆明基本围绕着滇池扩建。从一些公开材料来看，大昆明计划的设计者们本意还是想避免昆明城市向滇池发展，以减轻滇池沿岸的生态压力。但这种理想的规划已被现实抛弃。例如前几年滇池北岸的广福路，引起了意料之外的结果——房地产开发热潮，有规划者以此为例，警告不能再有绕滇池的道路网络系统。但是没过几年，昆洛路出现了。这条路的北半段正绕行滇池，插到离湖边很近的小新村一带，在那里越过马料河后转向呈贡新城区。而根据昆明市国土资源局公布的“现代新昆明规划——总体布局图”看，昆洛路附近的两侧是绿色区域。它们原本应为绿色植物覆盖地区，但实际上今天在那里的是新亚洲体育城和螺蛳湾商贸城等项目。最近正在修建的环湖路似乎又在重蹈覆辙。

这就是“城市恐龙化”，在其经过的地方，村庄耕地消失，水利设施遭到毁坏。实际上，就上述地区而言，已经有专家指出，旱灾的成因之一就是滇池流域的城市化急速推进，使滇池流域水资源的支持能力达到极限。